

军统 1949

厉华○主编

那些不能忘却的记忆

记白公馆脱险志士任可风

记白公馆脱险志士郑业瑞

寻觅快活岭——写在张露萍烈士殉难50周年

忆宋绮云烈士在狱中的二三事

我在秘密监狱十四年报告书

深深怀念我的爸爸

韩子栋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厉华○主编

军统 秘密监狱

1949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军统秘密监狱1949/厉华主编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0

ISBN 978-7-5006-9668-1

I. ①军... II. ①厉... III. ①中美合作所-史料 IV. ①D693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22554号

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 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电话: (010) 57350510

责任编辑: 李杨 candie_li@163.com

营 销: 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

电 话: (010) 57350522 (010) 57350524

印 刷: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印 张: 18.75

字 数: 215千字

版 次: 2010年11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: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-10000册

定 价: 26.00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57350526

主 编：厉华

副主编：陈建新、刘和平、李葭

编 委：郭德贤、傅伯雍、韩秀融

序 言

“死里逃生”是指从死亡线上又获得生命机会的人,“大难不死”是指劫难之中生命的顽强。没有多少人能够有这样的体验,也不希望一生中有这样的经历。但在本书中留下人生记录的韩子栋、郭德贤、傅伯雍、刘德彬、郑业瑞、任可风却是这样的人。在我同他们大多数人的交往中,给我最强烈的印象就是他们非常的“豁达”!从敌人的大屠杀中能够逃生,“别人都死了,你为什么能够活下来”?这是他们首先遇到的“审查”,在历次“政治运动”中也没有例外。在他们的一生中“生与死”总是与他们的生活、工作紧紧的关联。在极为复杂的人生中,无论是面对审查、无论是面对“运动”、无论是面对怎样的现实,他们始终保持一个态度:相比我们的战友,活下来看见了新中国就是最大的幸福!所以,他们能够摆脱荣辱祸福的恩怨纠缠,对痛苦、对欢乐、对荣誉、对打击,甚至对疾病,从来都是处世不惊、精神不垮。在他们生命延续的每一分钟所做所为,随时都在与自己的战友做心灵的沟通,“我们活着是为了他们”!这是他们常说的活。

韩子栋,从第一次与他见面到最后一次,他都是在为自己的小战友宋振中“小萝卜头”的事情奔波。他坚持在全国各地的学校宣讲“小萝卜头”的故事,在为各个学校建立“小萝卜头”班队而做工作……

郭德贤,数年来一直关心着那些死去战友的后人,为他们的工作、为他们的生活而努力执着地找有关部门、找有关人员,落实政策、落实待遇,甚至经常拿出自己的收入去帮助他们……

傅伯雍,协助纪念馆收集史料,寻找相关的人员调查情况,不断的整理烈士的史料,为了能够让那些死去的人精神永存,为了让那些

死去的人们的事迹不被遗忘,他持之以恒地坚持写作、坚持传播烈士的事迹……

任可风,一位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硬汉子。他语言简朴、说话直率、为人耿直,是那种眼睛容不得一点沙子,是非、爱憎都表现在脸上的人。每次参加纪念活动,他都要紧紧的与我握手,那力度是他内心语言的表达……

郑业瑞,历史注定我无缘与他相见,他带着遗憾较早地离开了人世。在采访他妻子余淑芸的时候,她送给我两盆铁树。这铁树10多年来已经分成了好几盆,长得非常的茂盛,我一直记得她跟我说的:“铁树是一种个性突出,不怕严寒、酷暑,四季常青的植物……”

刘德彬,在我的印象中他少言寡语,为人忠厚。他一生都没有离开“坎坷”二字,但是他一生都有一个不可更改的信念:我是党员,我是一个幸存者,有什么想不通的、又有什么不能面对的呢……

……还有许多的脱险志士。在与他们的接触中,我觉得他们是最有生活艺术的人。理想在他们的心目中从来都是坚定不移的,为人类共同的理想而活着!这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使他们从不沮丧,面对困难始终百折不挠。走自己认定的理想之路而义无反顾,随时学习、随时调整和纠正自己的短处,绝不文过饰非。宽容大度,有博大的胸怀去为人处世,有洒脱的态度去对待人世百态,面对一切总是坦然处之。从不计较个人得失,得之淡然,失之泰然,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,乐观向上总是保持生命的活力。

“世界上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灵。”脱险志士就是这样一类人,他们真诚、热情、谦虚、勇敢、坚定!他们立身处世的法宝——豁达。

厉 华

2010年11月24日

目 录

我在秘密监狱十四年报告书 / 001

忆宋绮云烈士在狱中的二三事 / 074

缅怀先烈伟绩——关于罗世文、车耀先、许晓轩、谭沈明的情况 / 091

寻觅“快活岭”——写在张露萍烈士殉难45周年之际 / 102

深深怀念我的爸爸韩子栋 / 113

那些不能忘却的记忆 / 137

终生不悔跟党走 / 235

作证歌乐山——记渣滓洞脱险志士刘德彬 / 264

悲情无憾的革命者——记白公馆脱险志士郑业瑞 / 271

气质特殊的革命者——记白公馆脱险志士任可风 / 288

我在秘密监狱十四年报告书

韩子栋

此文是韩子栋同志成功从白公馆监狱脱险后，于1948年1月23日，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递交的入狱及脱险的报告，是我们迄今为止发现的韩子栋同志对自己革命斗争经历，特别是狱中生活情况最详细、最全面的回忆材料。该材料一直存放在韩子栋同志的档案里，从未公开出版过。到了21世纪的今天，当年的战火硝烟早已远去。我们将这份珍贵材料展现到读者面前，让大家更加清晰地去解读那段历史，去了解一位无产阶级战士在黑暗中坚守信念的艰辛历程。

原文中涉及的一些人名、地名或组织名称，由于年代久远，关系复杂，我们也无法考证清楚，可能会给读者带来不便。但从尊重作者的角度出发，我们还是原文（仅有个别技术性校订）奉上，敬请谅解。

韩子栋同志生平简介：

韩子栋(1909—1992)山东省阳谷县人。1932年参加革命，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。1934年被叛徒出卖被捕，先后被关押在北平、南京、汉口、益阳、息烽、重庆等地国民党的秘密监狱，长达14年之久。在狱中受尽摧残，但他始终坚贞不屈，视死如归，并积极参与狱内斗争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和革命情操。1947年8月18日，他从白公馆冒死越狱，11月进入冀鲁豫解放区，经中央组织部审查，恢复了他的党籍。随即被派往山东范县参加土改工作，任

城关镇委书记。建国后,历任中财委人事局科长、北京机器厂副厂长、中央人事部副处长、一机部二局副局长、国家技术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等职。1958年调到贵州工作,先后任贵阳市委书记处书记、市政协主席、市委副书记、市委监委书记;“文革”后任贵州省政协常委、副秘书长、省顾委委员。1985年离休。他特别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,离休后他应邀到全国各地作报告,以自己的亲身经历,讲述革命传统,使听众深受教育。1990年他受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托,筹办“小萝卜头少儿教育委员会”。他不顾高龄,拖着病弱的身体南来北往,为培养革命接班人,无私地奉献余热。在他和有关同志共同努力下,先后在北京、上海等地少年儿童活动场所树立了七座“小萝卜头”塑像。尽管后来他身患肝癌,但他不顾病魔的折磨,仍以顽强的毅力到各地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,直至去世。

我安适的躺在组织怀抱里,回想过去14年的往事,这是我在几个月前不敢想像的,今天居然办到了,你说我心里有多么愉快呵!我应该一面笑一面写。可是14年的生活太惨痛了!沉重的心把笑压得死死的。当我想到最痛苦、最悲惨的地方,有好几次不能不放下笔,跑到河边上,默默的看那流水,一阵突然的愤怒,想把那河抓起来摔到天的那边去!

26岁到40岁,在别人是最幸福、工作力最强的年纪,我却和法西斯进行着掐喉咙般的悲惨搏斗。它整整占去了我十四年的黄金时间,我一面想,一面恨,这篇报告就是在想与恨的交织中写出来的。

这篇报告里,叙述的事实,尤其问答、对话等,我不敢保证秩序不颠倒,与原来的没有出入。但是在本体上,我相信是相差不远的。这不是我的信口开河,现在从正面,从侧面,从旁面,还可以找到证明。我请求把周科征、罗世文、范啸野等同志的报告及一切有关文件,通通

尽速尽可能的调出来,做一个案证。关于逃出来这一件事,如果命令范啸野同志在重庆就近调查,再令周科征、胡雅居两同志将他们在上海的听闻报告上来,我相信会很快弄得清清楚楚。我希望已经受了长期折磨的精神,不再浪费在等待里。也可以说我希望不再受长期等待的折磨。

报告里有许多应当写出来的人名、地名,年月日,没有写出来。不是我不肯写,法西斯给我十四年无情的折磨,大大的损坏了我的记忆力。那些地名、人名、年月日等,无论如何想,也想不起来。这是要先请首长们、同志们原谅的。

我在青年(时)坐牢,到了齿落眼花才跑出来,长期不平常的生活、不平常的战斗,造成了不正常的神经,不正常的心理。在这种神经、心理状态下,写不出好东西来。这篇报告的杂乱无章,错字白字满篇,使看这报告的首长们、同志们,不能不格外多费些精神,无论如何,我都应该自觉惭愧的。我先在这里,敬致歉意。

敬礼

韩子栋

1948年元月23日

家庭概况

祖父时我家是个破落户,家境虽然破败,他们仍未正式参加生产。父亲年轻时候,家里还有一二十亩地,叔父们跑到关外去谋生。

继祖母、继外祖母的脾气都很不好,因此父亲、母亲的外祖母对于父亲、母亲都格外照料。据我母亲给我说:父亲全凭着两个外祖母家的资助,在农暇时做小生意,哥哥贩红枣下江南。我记事的时候,父亲已有私田30亩,田是内伙(编者注:指家族内部)里种,每年给一定

数量的粮食。

在我7岁的那年秋收以后,分了家,粮食够吃的,柴草一点没有,我跟着哥哥拾柴砍草,开始了樵童和以后的牧童生活。12岁入学读书,在放假回家时,才下田种地。

我被捕时,家里已经有了六十多亩地,喂一牛一骆,除哥哥自己耕种外(这时父亲年纪已老,不能做重活),雇长工一名。我被捕后的第二年,父亲一因年老,二因忧郁,一病不起,与世长辞了。

父亲的死,是家庭经济败落的开端。据说抗战发生后,弟弟跟着岳县长、丁团长(土豪劣绅)打游击,后来升到团副。当岳县长解决了团长时,他放下了武器。因与丁团长的儿子同学,过往甚密,又因请假未回,住在孟楼二祖母家,岳县长疑其有变,处死。

余弟死后,余母亦死,弟媳改嫁,哥哥卧病,诸事连续,花钱不少。再加奸伪勒索,前后共卖地二十余亩。

父兄嫂对余本友爱。余初入学读书时,父亲原拟能粗识文字即弃学务农,余兄嫂宁愿自己勤俭刻苦,不欲令余失学。余所以能读书,全赖兄嫂勤苦节俭,任劳任怨支持之力。但余嫂性忌刻,自私好利,余兄甚畏之。当余被捕枪决的消息传到家中,余之音讯,从此断绝(月前我在冀鲁豫还听说:当时在北平的张、郭、段,在山东的盛、王、吴、申、王等同志也都根据传出的消息认为不屈被杀)。

父亲又死,嫂氏无所畏惧,欲暗令吾妻改嫁,吾妻不从,守志甚坚,兄嫂无如之何,乃行分家。据谓分地二十亩左右,地薄,碱,不会耕种,水旱连年,妻女生活颇苦。土地改革时,分沙地四亩,洼地五亩,枣林子等一二亩,今年先旱后淹,秋收芝麻四五斗,落花生约二三百斤,枣百斤而已。年前余兄已死,寡嫂一人有地六亩。

加入国民党的始末

我在民国十五年(编者注:1926年),在聊城省立二中读书时加入国民党。加入国民党后,搞工运工作,后来又改到鲁西南搞农运。我注意的是阳谷一带晒小盐的盐民。北伐军到山东后,盐民们要求公开晒卖是很合理的;小盐是盐民在一种碱性土地上的劳动生产物,是一种生活必需品,根本没有违禁。而且这种土地,只能产盐,不生产粮食,既强迫人民完粮纳税,又不准晒盐,天下岂有此理。无耻的国民党初则推拖支吾,继则干脆说卫生署化验小盐有毒,余愤而走济宁,在教训班任课。

五卅惨案后,山东工业区淄博煤矿工人,数与日人(编者注:日本人)运用包工们领导的民团、红枪会发生相当大规模的械斗,互有伤亡。日人亦有因此失踪者,无耻的国民党,既垂涎此工人区的领导权,又无人能活动得成功,国民党省党部欲派余前往,余初不肯,后因余所在之训练班,变为改组派、CC(编者注:国民党“CC”派)角逐之所,我在那里亦觉无味,于民国十八年(编者注:1929年)夏末,赴淄川组织煤矿工会。

有一个湖南人周月波在淄川鲁大煤矿大洪地区活动已久,工人们很信仰他。工人们和民团、红枪会的斗争,是他领导胜利的。他在鲁大煤矿已组织了工会,厂方很恨他。我到淄川去时,国民党省党部刘涟漪就教我注意监视他,如果必要时就逮捕他。

余到淄川并未马上组织工会,也未说明我是去组织工会。我调查厂方的各种情况,人事的纠纷,劳资对立的情形,公司与包柜的关系,里工外工分裂的原因,周月波与李文诚等之磨擦等。

周月波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,确实有一部分工人信任他。周月

波自己也知道厂方恨他,政府党部注意他。我再三向他说,只要他没有其他轨外行动,愿和我共同组织工会,我能保证他安全无事。我并且郑重声明不与厂方勾结,不出卖工人利益。我要求他与李文诚、顾焯等的磨擦立刻停止,里工与外工的分裂,尽量想办法消除。得到了他的同意后,我向国民党省党部建议,就现有之工会成立淄博区矿业工人总工会,暂以周月波、李文诚等为委员。而省方竟以余及汪锦芝等7人为委员,组成淄博区矿业工会筹备委员会,经费每月竟定至2200元。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周月波,并说明我不就职。周月波极力劝我就职,并愿以全力助我工作。淄博矿区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,委员们洋服革履,派头十足,吃喝应酬,唯恐落后。我除和周月波就原有之工会,注全力组织鲁大工人外,且处理日常劳资零星纠纷,筹备会委员们初则意见纷纭,枝节横生,继则落得“一推六二五”,拿钱不管事。伤脑筋的事任予处理,成功、胜利共享,失败由我一人负责。他们说风凉话,当事后诸葛亮。余因有周月波之合作及处理日常工头与工人间的小纠纷获得了胜利,在工人间的威信日渐提高。日籍工头因打工人向工人赔偿道歉等,认为有失大和民族的尊严,愤而辞职二人。

“五四”运动时留学日本帝国大学,领导反日运动,被驱逐出境的杜中,这时在鲁大公司总务科工作。我很尊敬他,公司的事情他也给我提供了不少珍贵的材料。当时工会筹备会已无形中成了畸形状态,筹备会委员们认为我包办工会,由于嫉妒渐生愤懑,但事实所逼,亦无如何时,杜中有一次对我大加赞誉,说我是少年英俊,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,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,如能找个机会出国考察研究二年,将来对社会国家的贡献,一定更大。并谓钱川(日人,公司总务科长,是鲁大实际的负责人)、各包柜对我也极敬仰。如果我能根据总理的劳资协调原则,把鲁大的劳资关系做更合理的整理,我相信他们(钱川、包柜等)一定愿以朋友的名义,捐募数万元,为韩委员出国时的费

用。我说：我向来处理任何劳资问题，都是绝对根据“三民主义”劳资协调的精神，阶级斗争不适合于中国。如果你发现哪个人不根据劳资协调的原则，拿阶级斗争的理论，挑拨我们劳资的感情时，我愿立刻加以纠正，必要时可通知政府逮捕。请你给他们说：“用不着给我筹学费，我绝对根据劳资协调的原则，处理劳资问题，他们尽可放心。”

十一月间，我因为布置取消包工制试行八小时制，“借零钱”（厂方发工资时不发分厘等零钱）等问题，发动工潮。资方允许自即日起，工资照实发放，工人要求清算过去的账目，资方愿出二千元了事，工人不肯。正在僵持不下时，余得一友人讯，教余即速离开淄博，愈快愈好，切勿迟延。余得讯后，知有变故，急将此讯通知周月波，乘夜车离淄川。原来国民党中央给我定了一个图谋暴动的罪名，永远开除党籍。周月波逃出后，民国十九年（编者注：1930年）内战时，又潜入淄川，遭国民党逮捕杀害。

加入共产党后的工作

“九一八”事变时，我在中国大学读书，兼营春秋书店。我在春秋书店经常翻印“左倾”读物。如《左派幼稚病》、《国家与革命》、《世界史纲》、《文学的理论》等，均先后翻印过。我当时希望出一本又浅近又完整的经济学著作，经周怡介绍，武老先生给我一部莫斯科中山大学油印中文本，拉比多所著《政治经济学》，叫我出版。因此与周、武的来往渐多，我记得有一次周怡拿了一份《红军告农民书》（记不清楚是不是告“农民书”），叫我想办法印五千份，我毫无迟疑，欣然应允。周笑谓：“你不怕吗？”我说：“有什么可怕的。”

民国二十二年（编者注：1933年）春，经周怡的介绍，加入了共产党。武先生派我打入“蓝衣社”内部工作，直接受武指挥，禁止我和色

彩重的人物多往来,叫我在外表上成为落伍、右倾的反动人物。这一点我始终没做好。

我经孔福民、杨大卫的介绍,举行了宣誓仪式,正式成为“复兴社”(即“蓝衣社”,他们自称“复兴社”)的社员了。社员的任务:开会、收集情报、介绍新社员。我那小组内有学生、有教员、有市党部职员。起初我只能得到与我那组有关系的事情。“复兴社”严禁社员发生横的关系。这种规定起初对我的障碍很大,但很快地被我克服了。我得到党的允许,开始布置工作关系,我发动国民党员,尤其是国民党的公费生,加入复兴社,先后有袁聘之、崔连儒、杨宗周、张希内、顾大光、刘金铠、赵伯涟、张鹤民、杜方策、王永福等相继加入,关系既多,我的工作就不限于我那一组了。但这些人中,除张鹤民思想略进步,顾大光无所谓外,其余均甚落伍,没有接受进步思想的可能。他们散在各组中,我虽能很技巧地从他们口中知道些“复兴社”在各大中学的人数、他们所注意的分子、活动的情形等,但这种方式很容易引起他们的怀疑。

当时的“复兴社”,在北平有“黄埔与非黄埔”、“北方人与南方人”的冲突。这是我建设保护关系的好基础,我极力散播这种斗争的尖锐——事实上确也很剧烈。如果自己没有靠山,没有力量,想在“复兴社”内不当牺牲品站住脚,那是不可能的。我们这些人既没有靠山,再不想法团结自己的力量,我们只有白白地当人家的牺牲品。朋友们渐渐地同意这说法,于是不拘形式的横的组织关系发生了。我们以默许的方式认孔福民(此时彼已为北平支部负责人之一了)为我们的领袖,我们在这种关系中,可以自由交换意见,报告自己组内的情况,我们要在各种冲突中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,我们要以自己的力量,使能当靠山的人找我们。这个关系发生的效力不小,不但开展了我对“党”的工作,且加剧了复兴社内部的斗争,如王东台与廖兴序的斗争,贾

毅生等反对刘健群、邵令江等,与我们多少有些关系的。

民国二十三年(编者注:1934年)“复兴社”计划在北平工人中建立小组,它的方法是先在工厂内设立工人学校,由廖兴序负责,我被派为教员,因为我在工人学生中最受欢迎。于是引起了一件使我难以处理的事来:孔福民等就此替我吹嘘标榜,廖兴序等亦认为我能干,有办法,但有可疑之点:(1)小组会中我对政治的分析头头是道,清楚了;(2)我与春秋书店有关系,春秋书店售卖反动书籍;(3)俭朴,不修边幅;(4)在短期内能获得工人的如此信仰,如另外没背景很少可能。因此他们派廖兴序对我个别谈话。但廖兴序每次给我谈话时除重复夸大他在“复兴社”华北分社监事的地位,在北平所起的作用,冀北几县如何被他控制着,对工运如何有兴趣,如何重视有办法的能力强的同志,称赞我在工人学校中的成功、所受到的欢迎,希望我努力给团体多做点工作外,就是扯些无聊的事。因此,我意识到他并不是疑惑我“左倾”。他疑惑我的根据,除与春秋书店有关系这一项外,其余均不能成立。我与春秋书店的关系,自我加入共产党后,我早就做过准备。经理的名字已经换过了,社会局营业注册簿上,春秋书店的名字不是韩子栋而是赵秀峰。春秋书店的来历和我的关系,我也向他们做过口头报告,也算于无形中备过案。我相信我与共产党的关系,这时间他们一点也不知道。他说我有问题的用意,是在威吓孔福民,冲淡我和孔福民的关系,而与他发生联系。我把经过情形向周怡报告,周怡的意思是贴紧孔福民,借孔福民与刘健群、邵令江发生关系,应付廖兴序,减少工作障碍。但问题已发展到牛角尖里,想在牛角尖里扩大用武的地方是不容易的。但未爬出牛角尖前,也只有尽量去做。

不久之后,我母亲病重,要我从速回家。我亦欲趁廖未失望、孔未怀疑前,借此暂离北平,缓和这种过紧的局势。徐图良策,免致弄成僵局,不易转圜,妨碍以后的工作。周怡虽不十分同意,但亦未坚决禁止

余回家。我既决定回家,周怡给我说了两件事:(一)注意山东军队的驻防地、番号、调动情形、纪律等;(二)如果我来时,他不在北平,定好找关系的办法。如果我找组织,即至××胡同××号(胡同名号我已忘记,地址在北沟沿北口里路西进胡同路南第二个门),问答法如下:

“周先生在家吗?”

“贵姓?”

“韩大可”。

进入大门,走向北屋,由右侧进屋门,接见我的人偏左方站,问答如下:

问:“什么时候来的?”

答:“十二点。”

问:“怎么来的?”

答:“坐津浦车。”

问:“几次车?”

答:“102次。”

如果组织找我,信寄中国大学韩大可收,约定地点见面动作问答与上同。我到了十月才回到北平,中国大学有一封韩大可的信,辞句不对。我到××胡同××号去过一次,里面的人说:没有姓周的。信的辞句既不对,约定的地方又说没有姓周的。正在忧虑的时候,就被捕了。

被审记要

我在民国二十三年11月6日在北平被捕,关在宪兵三团。第一次审问我的刽子手,在我进他的屋门时,正翻阅一堆文件。他叫我坐在一条凳子上,待了好久,他才狞笑着问我:“你是韩同志,你认识我吗?”我迟疑了一会儿,他的脸马上长下来:“快说。”我斩钉截铁地说: